

# 莫洛托夫访谈录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编译



莫洛托夫访谈录

莫洛托夫访谈录

莫洛托夫访谈录

# 莫洛托夫访谈录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作者：〔苏〕丘耶夫

译者：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 莫洛托夫访谈录

——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

作者〔苏〕丘耶夫

译者：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发行所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插页 4 462 000 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200 册

ISBN7—206—01660—X

D·491 定价：11.00 元

Чуев ф.

Сто сорок Бесед с Молотовым; Из дневника ф.

Чуева;

-М. : ТЕРРА, 1991.

丘耶夫著:《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丘耶夫根据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笔记整理而成。莫斯科大地出版社1991年版。

## 译者的话

本书是苏历史学家、教授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同莫洛托夫进行140次谈话的记录，内容涉及国际事务、外国著名活动家、个人经历、和列宁在一起、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农业集体化、关于肃反、何谓社会主义、生活轶事等诸多方面。作者在书中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

莫洛托夫于190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苏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近30年，是苏联第一代革命家，苏维埃政权元老，亲身经历过近100年俄国和苏联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苏共的创建与发展、十月革命的准备与发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1937年肃反、卫国战争、战后经济恢复、苏共20大、苏联改革初期。他的谈话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将该书全文译出，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书中所谈及的问题，观点是否正确，材料是否属实，请大家注意鉴别；特别是对中国个别情况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更应持批判的态度。

本书的译者有：严亚平、梁月槐、于洪君、李玉贞、王福曾、朱晓莉、黄殿伟、刘晓松；校者有：王谊民、王羊、巴芳辰、许小海、慈国巍。全书由慕南统校。

## 作者的话

我在白俄罗斯火车站上了电气火车。对面坐着一个男孩子。他在覆满水汽的玻璃窗上写着一些数字，好像是卜算寿命的长短，尽管他自己未必这样想。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觉到这个男孩子能活到2060年。现在他约十一二岁，我不会再见到他，即便见到，也未必能认得出来，他大概也是这样。不过他今后的见识肯定要比我广得多，心境也会比我平和和明朗得多，今天令我思绪万千，早就想道出的心里话，对他来说将平淡无奇。我力图按照“不怨天尤人”的精神，秉笔直书。

我五岁识字。家里只有政治书籍，还有一份《真理报》。我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后来又对历史感兴趣，且长久不衰。也许，正因为如此，生活才赐予我同许多政治、国务、军事、学术界名人和英雄人物会晤的际遇。脑海中浮现出的，日记本中跃然纸上的是苏联元帅A·E·戈洛瓦诺夫和Г·К·朱可夫；海军上将H·Г·库兹涅佐夫；国务活动家K·T·马祖罗夫；科学院院士A·A·米库林、C·K·图曼斯基、A·M·柳利卡；飞机设计师A·C·雅科夫列夫、A·A·阿尔汉格尔斯斯基；飞行员M·M·格罗莫夫、M·B·沃多皮亚诺夫、A·И·波克雷什金等许多人的鲜明形象。上述人中每个人的事迹都能写成一本书。

莫洛托夫在这些人中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从1969年到1986年他生前的这17年中，我与他频繁会晤，现有140次谈

话的详细记录，每次谈话平均约持续四五个小时。不管人们如何对待莫洛托夫，反正他的意见是具权威性的，他的一生已与我国历史密不可分。他曾与列宁共事，当过筹备彼得堡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党和政府中地位显赫，主持我国外交政策，几乎同 20 世纪所有重要人物都会晤过。

莫洛托夫的见解是主观的，在许多方面与现今发表的和奉为真理的东西背道而驰。但是在 17 年的经常交往中我却一定程度上把这位自青年时期就为理想献身的人做了一番研究。毫无疑问，他讲的许多内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至今难以核实和验证。因此我将做到原话照录，尽量不加什么评注。同莫洛托夫谈话的题目五花八门，涉及我国十月革命后历史那些最紧张的关头。本书乃是同莫洛托夫谈话的摘要，我们谈话逐日的记录，现发表的仅仅是 5000 打字页的“莫洛托夫日记”中的一小部分。这些年以来，我经常写日记，详细记述每一次谈话，每一段言论，并在后来的会见中反复问询，核实补充。

本书所载并非莫洛托夫回忆录，而是真实的谈话录。莫洛托夫侃侃而谈，并不是口授。从他嘴里“挤出”一些话来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在我们刚相识的时期。某些事件莫洛托夫第一次没有放开来讲，所以过了 5 年、10 年或 15 年之后我们又返回到这些话题上来。

莫洛托夫对事情的看法是从不更改的。他从不改口，说话经得起检查。谈问题的角度尽管时有变化，但回答的内容一如既往。所以本书出现了同一段文字标有几个日期的情况。

去采访他之前每次务必做好充分准备——打算问什么，记住有关文件。我虽经常与他会晤，谈话时间很长，但我每

次都牢牢记住一点：我与之谈话的——是莫洛托夫。

……他回答问题时反应之快实在令我瞠目。谈话伊始他通常很少开口，多半是听，自己提点问题。谈话过半时他才兴致方起，讲一些唯有他一个人知道的事。那时他双颊绯红，双目微眯，表情似青年人炯炯有神。

有时候，莫洛托夫回首早年的往事时会激动不已，略微有点口吃，但他不在辅音上打嗝，而是把说不出来的那个词的第一个音节重复上一两次，如果是单音节词，他就把整个词说上一两遍。他赋有幽默感，但依我看，他不喜欢笑话，虽则有时他自己也说点。他非常懂诗歌，能说不少民谣，唱伏尔加河一带的民歌。乍看上去，他会给人以干巴巴之感。实际上他很善于同各种文化层次的人交往。

同他谈话时我情不自禁地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做到讲话得体，言简意赅，因为他本人和他的师长们都容不得别人罗嗦。莫洛托夫用词严谨，有时甚至咬文嚼字。他喜欢刨根问底，固执，不出尔反尔，很少谈自己。

“沙皇帝国的所有监狱您都坐过了吗？”

“只是坐过所有大的监狱。”他当场就修正。

1985年我写了一篇有关他的随笔——文中没有回避任何敏感问题。他过目了，总的予以肯定，只做了几处修改。我把文章交给《真理报》，但得到的回音是：本报不登关于曾在本报工作过的编辑人员的材料。的确，1912年4月22日莫洛托夫曾参加过《真理报》创刊号的出版工作。

他明白，我将写一本有关他的书。他本人没有写过回忆录。“谁在什么地方说了些什么，谁被排挤到什么地方去了……对此我全不感兴趣。列宁没有写回忆录，斯大林也没有写回忆录。有人说见过我写的一书。其实，我写的不是回忆



录，而是谈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用农民的话说，‘我们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莫洛托夫说。

当初我并不知道能有多少次这类会见。当我们的会晤频繁起来时，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吧。因为1969年我首次登门拜访他时，他已经快80岁了。他中等个头，体魄健壮，宽大平直的前额，一双敏锐的褐色眼睛——目光明亮，虽年迈仍炯炯有神。唇上是一道硬硬的灰色胡子，在他那个年代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蓄胡子。

我们的谈话是怎样进行的呢？一般是我到茹科夫卡他的别墅去。他在门厅迎接我——热情，如家人一般：

“是谁，是丘耶夫同志吗？”

我们照例在桌旁就坐，吃过饭就到林子里散步。莫洛托夫对我讲过：“我当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可就这样，也有人窃听，咱们还是出去走吧！”我们头几次见面时他说话不多，回答问题也很拘谨，——大致像后来对不太熟悉的人那样。后来话就多了。

他最引人瞩目之处是：朴素、本分和节俭。他时时注意不要浪费，例如没有人的房间里从不开灯。他的衣物穿用时间都很长：这顶帽子、那件大衣都还是他在政府任职时照像时用过的。居家常穿一件厚实的褐色衬衫，衣襟露在外面。逢年过节才着灰西装，打深色领带。

我第一次看见莫洛托夫是1955年，那时我还是少先队员，参加了以莫洛托夫命名的克里米亚全苏共产主义少先队健身营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我哪里能想到若干年过后会住在莫斯科，由熟人领我到格兰诺夫斯基大街，我居然又见到了他——这次是在他的家中，他已经是另外一种身份了，成了退休金领取者，已被开除出党，但他矍铄而乐观。原来他

知道我写的诗，就为这些诗，那些年代我可吃了苦头。

莫洛托夫至死记忆不减当年，我当然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我并没有一个整理笔记的初步计划，只决定把笔记按内容分成若干个章节，区分的结果当然是十分概略的。很多内容是交织在一起的。可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既要大量材料中挑出吸引读者的内容，又要不破坏材料的真实性。

要从我手头 5000 页的日记中挑出不到 700 页整理成书，这真可谓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我要重申，本书并非莫洛托夫回忆录，因为这里的许多内容是私下讲的，如果有什么莫洛托夫回忆录，这些内容是不会收进去的。

对于谈话记录，我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尽可能按专题整理的，所以相隔多年说的同一内容的话可能放在同一段落之下。我保留了日期，因为这些日期对我很有价值，是个纪念，而读者又可从中了解哪些事件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叙述的。这是一本日记，我力求对之不做订正，不加粉饰。书中可能有不确切、重复之处，但在我们见面期间当时就是那样说的，那样记的。

……不过，这本日记毕竟闪示出一个人遭遇的某种形迹。对我家来说，莫洛托夫算得上当时领导人中最受尊敬的一位。斯大林自更不必说了。斯大林是上帝，无论就职位还是人们内心的情感而言，他都是至高无尚的。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事实。斯大林之下就是莫洛托夫了。持这种观点的大概不止我们这一家。我有几个朋友为纪念莫洛托夫就取了斯拉夫卡<sup>①</sup>为名。这可不是用任何党的命令所能办到的。

1946 年我 5 岁时曾很入迷地念过莫洛托夫在联合国的

---

<sup>①</sup> 莫洛托夫的名字。——译者

一些讲话，至今还能背诵一些段落。我的父母也把我国坚定的对外政策同莫洛托夫的名字连在一起，当时的对外政策很得人心，唤起人们的祖国自豪感。

1954年我在少先队夏令营接到妈妈的一封信，我把它保留至今：“关于莫洛托夫从日内瓦给我们带来的大喜讯，想必你已得悉，这对于一切向往和平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特大喜讯……”这是指越战结束了，信中讲到一个陌生人，一个政府委员时，其语气犹如谈及亲人……

我的父亲已经辞世，过了一年，母亲也故去了。一个是伟大战争时期出色的飞行员，另一个是普通妇女，都为国捐躯了。父亲活了37岁，母亲34岁。他们是普通人，一生勤恳工作，我们家中没有担惊受怕。过了几年我第一次见到外祖父。30年代他吃了些苦头。他所讲到的情况与我读到的有关“集中营”的文献相左。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如上述，我第一次见莫洛托夫是在克里米亚全苏共产主义少先队健身营。我紧挨着他旁边站着，甚至摸到了他的西装衣袖。他讲话时我给他照了张像。那年我14岁。该营篝火广场在聚光灯照耀下一片通明。我们在这里为他送行时放声歌唱：

敬爱的莫洛托夫  
时刻关心我们。  
他的业绩  
数也数不清！

又过了14年，我到他家去时，他在这张照片上为我签名留念。我们见面的次数多起来了，一直持续到他故去。也许是命运把我与他联系起来。克里米亚区全苏共产主义少先队健身营是以莫洛托夫命名的，后来我又毕业于以莫洛托夫

命名的莫斯科动力学院……

我不想评估他本人、他讲的内容和他得出的结论，尤其不想评估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那个时代。我想，欲做评估恐为时尚早。

我没有看见他工作时的情况，不知道他身居高位 40 年，当国家第 2 号人物 30 年是一副什么情景。

至于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世界上倒是不同政界要人就此发表过意见。我听他的一些同仁，外交部的老工作人员说过，列宁想让莫洛托夫当外交人民委员，可是契切林提出的候选人是斯大林。

特命全权大使 B·C·谢苗诺夫说：“革命后，我国对德政策的决策人是列宁、斯大林和契切林，后来则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都喜欢青年人，所以外交部有不少年青人工作。”

我并不知道莫洛托夫在对外政策战线上的情景，但却知道他没有在联合国用鞋敲桌子。他在国内活动的情况已见诸于多种书刊了。一些人认为他唯斯大林之命是听，是个罪人，另一些人认为他是“革命的铸造者”。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反正他是 20 世纪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当事人。尽管事过境迁，此类人物亲眼目睹的情况总是饶有兴味并且极为重要的。一切都在变革。马涅日广场上的“共产主义必胜！”的标语，多少年耀人眼目，如今已被取下了。

作家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几次求我引见莫洛托夫。但我却没能说服后者，因他不喜欢见生人，跟谁熟了，他就与之往来。不过也有例外，乘“他心绪好”时，我甚至把几个激烈反对他的人领到了他家里。这些人博学多识，有修养。但

仇恨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莫洛托夫通常用三四个小时回答所有最敏感的问题，谁也无法在争论中驳倒他，尽管双方各持己见。

费奥多尔·阿勃拉莫维奇总算进了茹科夫卡别墅，他问莫洛托夫：“您信仰共产主义吗？”

对于莫洛托夫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关键在于对他世界观的理解。对于共产主义，他不仅信仰，而且坚定不移，并且按自己的理解去做一切他认为会促使这个目标尽快实现的事情。他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来衡量每一件事。

我曾问过他：“列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回答说：“目标明确”，又补充道：“列宁每做一项工作都是为了挖帝国主义的墙脚。”

莫洛托夫绝不会放弃原则性。凡出自他口的话，并不仅仅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斯大林分子”试图作出的自我辩护，而是出自他坚定的信念。况且我在这么多年里从来没有见过他试图为自己辩护。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任何问题都有坚定的看法并且始终坚持到底。令他不解的是，如果一个人有坚定信念，那怎么可能被人征服呢？倘若他认为某事是党的需要，工人阶级事业的需要，他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不同的时期，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出生入死，身先士卒。单是1942年飞越德国占领区到伦敦、华盛顿出访就够令人咋舌了！

既然要干事业，就会有是有非，有功有过。无论对于任何人，既可以贬他，也可以褒他，一切取决于讲话人的立场。我觉得，象莫洛托夫这样的人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是有他自己的尺度的。这也部分地是他的悲剧所在。

人们对善恶各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也不去考虑我日记中的莫洛托夫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国历史中的同样一个事实或事件，对张三——义愤填膺，对李四则欢喜雀跃。

我的目的在于真实确凿地把我听到和记下的东西反映出来，公诸于众。

“你们俄国人真怪！”一个德国朋友对我说。“你们竟然对战胜了希特勒的斯大林肆加污蔑，而把叛徒捧上了天。”

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事。有个德国党卫军长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让两个俄国将领：A·A·弗拉索夫和 A·H·邓尼金对质。

“我不认识这位将军。”让邓尼金认弗拉索夫时，邓尼金这样回答。

“自然了，”党卫军分子说，“你们在不同的时期反过同一个敌人——布尔什维克。”

“可是我没给他干过事！”邓尼金回答。

……从我的观点看，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不管他是什么人，如果他变节了，那么他也就丧失人格了。

问题固然成堆，但如果这过错全在斯大林一个人身上，或者全在当时和斯大林一起共事的所有领导人身上，那么这位斯大林或那少数几个人该有多么惊人的排山倒海的力量呀！这就是“英雄与群众”关系。不，很明显，若没有坚强的党，没有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是做不成这些事的，而对于人民来说，从来就不存在选择道路的可能性，至少无论过去或现在，当改革已成定局，别无选择时，从最高层的讲坛上就是这样向他们说的。

有的书中说斯大林欺骗了人民，恐吓人民，把人民吓住了……但是，如果人民那么容易受骗，他们还能有什么价值

呢？

重要的是，斯大林也好，莫洛托夫也好，这些高层领导人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列宁在世时都未参加任何反列宁的集团。若研究那个时期，并非所有情况都一清二楚。许多事很难以理解，更不必说替它辩解或予以谅解了。因此必须弄清情况，研究文件，倾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的许多同胞，特别是我的同龄人和我比我年长的人竟如此健忘。而我对于40—50年代报刊上提到的事件、说法、姓名、日期，却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原著名的军事检察员说他从前并不知道列宁遗嘱中曾对斯大林作过评价。其实，40年代还是孩提时我就见到过。我父亲书架上有几本政治书，其中有一本是1936年出版的，那上面就引述了列宁遗嘱中最敏感的段落，同时还有斯大林加的注释（那本书叫联共（布）党史学习参考文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印数为305000册）。我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本纸已发黄的书至今还在我手中。而第20和第22次党代表大会最高讲坛上，竟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斯大林好象隐匿了列宁遗嘱，我为此感到气愤，会后便把这本书给一些熟人看，这些成年人好奇地翻阅着这本书，脸色阴沓，一言不发。就这样，我15岁的时候就产生了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想自己去查查史书，弄个明白。况且除了街坊父老兄弟以外，没有人给我指出方向，确切说，我是靠自学成才的，因为父母双亡，只好自己管自己，还要带年幼的弟弟。

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生活过的那些年代，当时的所有领导人全都欺骗了我，只有斯大林除外。不知为什么，人们当时都相信了他。至少在他当政期间我生活的那12年里给

我留下了这样的记忆。现在许多情况已明朗化，公开了，但前面我已讲过，我早就在整理这些笔记，至于日记何时能付印，是现在还是百年之后，这对我都无所谓。我并不指望收到廉价的轰动一时之效果，所以也不急于靠这本书去迎合乃至超过当代潮流，就象我对待自己诗作的一贯态度那样：某些诗写完后过了二三十年才发表。这些诗虽已失去了应时效果，但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眼前这本书我已花了21年时间，但我并不急于出版：只是等人们都读腻了这类题材的东西时再让它出版吧，这样更有意思些。好在我来日方长，也许我会如同开头提到的地铁车厢里我对面坐的那个男孩子那样……

我在《星火》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列宁和斯大林在戈尔基》那张很有名的照片是剪贴而成的，是伪造的。我立即就想起我和莫洛托夫一起翻阅1922年9月24日《真理报》插图副刊的事，那上面就首次登了这张照片。列宁一直是读《真理报》的。这么一来不就成了列宁在世时别人就搞假照片了吗？如今的仇恨心理真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坐在桌旁。窗外是俄罗斯明朗的冬日。莫斯科近郊，如山的雪堆。树木、灌木林、房顶都在白雪覆盖之下……

“并非一切尽如人意，”莫洛托夫说。“许多事的实际结果走了样。许多事做得很好，但现在这已经不够了。你们是坐享其成的，不过你们还要踏踏实实地干些年。”

他说话的时候，我在看列宁葬礼的照片：斯大林抬着列宁的灵柩，重得压弯了腰，旁边是莫洛托夫年青有力的肩膀……当时的领导人象我们的国家一样，都还年青。

莫洛托夫在茹科夫卡的国家别墅度过了他最后的12年。妻子去世后（热姆丘任娜1970年故去），他由两位非常体贴



热情的内侄女照顾，一个叫萨拉·米哈伊洛夫娜·戈洛瓦涅夫斯卡娅，另一个叫塔季亚娜·阿法纳西耶芙娜·塔拉索娃。她们二位和主人一样，都热情好客。

我们一般在白天12点至16点之间谈话，

“就着汤吃吧，古老俄罗斯的饭食。记得从小我就是这样把黑面包沾上汤泡着吃。”莫洛托夫说。“吃梨吧，是从格鲁吉亚运来的！喝点白兰地，记得斯大林说过这是打底的！我也可以来一点。这个空瓶子该拿下去了。米高杨说过：‘空酒瓶，祸将临’。”

绍塔·伊万诺维奇·克万塔什维利是从1970年到1977年参加了我们的谈话的，约占一半，即140次中他参加了70次。他是学历史的，人极善良，性格活泼、开朗、好动。1977年12月他突然去世，还没活到50岁。他总建议我这本书这样开头：“这样写吧：一个古老的白俄罗斯火车站……”

可此后莫洛托夫又活了近9年，我从白俄罗斯火车站再到他那里去时已没有绍塔·伊万诺维奇相伴了。前来的有老作家朋友、学者、军人，但结识人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在我们经常在莫斯科见面的岁月里，一些最权威机关曾几度传说莫洛托夫已故去。一听到这消息我总是马上往茹科夫卡打电话：

“可以请莫洛托夫接电话吗？”

“我就是。”

这样的情况有过3次，只多不少。我走近他家，别墅小房的窗户上映着他的头影。他在工作。

“我是21世纪的人。”他说，“人们步入新世纪时还那么迷信，什么都怕！”

他活到了“飞碟”时代，活到了党采取改革和加速发展